



永远的

YONGYUAN DE
CHANGZHENG

长征

杜福增——刘波◎著



红色舰队

★
红四方面军长征

珍藏
闻录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永远的 YONGYUAN DE
CHANGZHENG

长征



红色艄队

红四方面军长征见闻录

杜福增 | 刘 波 ©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艄队：红四方面军长征珍闻录 / 刘波，杜福增著.
—西安：未来出版社，2017.1

(永远的长征)

ISBN 978 - 7 - 5417 - 4997 - 1

I. ①红… II. ①刘… ②杜… III. ①红四方面军 - 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6817 号

红色艄队：红四方面军长征珍闻录

HONGSE SHAODUI; HONGSIFANGMIANJUN
CHANGZHENG ZHENWENLU

丛书策划 尹秉礼 高 安

执行主编 刘 波

责任编辑 孟讲儒 唐荣跃 须 扬

封面设计 许 歌

技术监制 宇小玲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未来出版社

地址：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 邮编：71008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17 - 4997 - 1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序 篇	从鄂豫皖转战川陕	(1)
第一章	策应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嘉陵江战役	(21)
第二章	转兵川西迎候中央红军	(55)
第三章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87)
第四章	张国焘的小算盘	(121)
第五章	红一、四方面军携手过草地	(155)
第六章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177)
第七章	转兵西康迎候红二、六军团	(235)
第八章	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甘孜	(267)
第九章	红二、四方面军携手征服大草地	(295)
第十章	智斗张国焘分裂主义	(317)
尾 声	悲壮的五千里西征	(345)



序篇

从鄂豫皖转战川陕

“小长征”开辟川陕苏区——木门会议猛烈扩军——反川军“六路围攻”——红军中最大的娘子军：妇女独立师

“小长征”开辟川陕苏区

提起长征,通常是指始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两年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最终在陕甘苏区会合的历程。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到早在两年之前的1932年10月,当时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就已进行了一次3000里的“小长征”,开辟了“川陕苏区”。

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其前身是鄂东根据地、豫南根据地和皖西根据地。1927年11月,潘忠汝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起义,开辟了鄂东根据地;1929年5月,徐子清等领导了河南商城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11月,舒传贤等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皖西根据地。1930年3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1930年6月,召开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

鄂豫皖苏区以大别山为中心,辐射周围20余县,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鄂豫皖苏区的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成立于1931年11月,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下辖红四军(军领导由方面军总部兼任)和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

章),总兵力共4.5万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同年6月,蒋介石于庐山召开会议,确定了集中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苏区的红军主力,全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方案。

设在武汉的鄂豫皖“剿匪”司令部,下辖左、中、右三路军。何成浚指挥的左路军主要负责“围剿”湘鄂西苏区,蒋介石的中路军和李济深担任司令官的右路军是“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主力。

中路军和右路军总计24个师另6个旅,30余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中路军的第二纵队在第一、第三纵队配合下担任主攻,第四、五、六纵队及右路军为助攻。其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计划先攻占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逐出鄂豫边境;然后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向南,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压迫在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而歼灭之。^[1]

虽然,敌军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了数量和质量的优势,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形势对红四方面军不利。但如能利用好苏区及红四方面军自身的优势,打破敌人的“围剿”还是有可能的。1932年年初至5月红四方面军成功地取得了四次战役(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的巨大胜利,部队的实战经验得到提高,士气高涨,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作为主战场的鄂豫皖苏区,群众基础较好,又有较为广阔的回旋空间,存在着有利于红四方面军后勤补给和运动中相机歼灭敌军的优势。国民党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中央与地方部队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利用的重要因素。

然而,当时的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对形势却出现了错误的判断,对已经开始的第四次“围剿”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粉碎第三次“围剿”之后,他认为国民党已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主要的敌人已经是帝国主义。基于此判断,张国焘定下“坚决进攻”的战略方针。在6月至8月的两个月时间内,未在物力、财力、军力上做充分应对“围剿”的准备,反而继续贯彻向京汉线出击的“进攻”战略。先进逼罗山,破坏平汉路,并沿平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陂一线的敌人,进而威逼武汉。结果在8月上旬,敌军开始进攻苏区中心七里坪一带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只能撤围麻城,仓促应战。劳师远征,又未充分准备回师应敌,已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置于不利的境地中。

8月至9月的冯寿二、七里坪两次战斗,红军虽然给当面之敌第十师和第二

师以巨大杀伤（共歼敌军官兵 5000 余名，击伤第十师三十旅旅长王劲修，缴枪 3000 多支），但未使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根本变化，仍在原地兜圈子，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9 月 9 日，苏区党政机关所在地新集失陷，方面军主力和苏区党政机关向皖西、鄂东方向撤退。

10 月 10 日，鄂豫皖分局在红安县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局势，并研究红军的下一步作战行动。会议中针对当前的局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张国焘、徐向前等主张跳出根据地，待机歼敌后再返回苏区。另一种是沈泽民等主张留在苏区就地分散游击。最后，依据多数与会者的建议做出决定：留下红七十四师、红七十五师与各独立师、独立团，由沈泽民负责在苏区坚持斗争（该部即为新的红二十五军之前身）；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红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向平汉路以西活动。第二天晚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开始出发转移。三天之后，蒋介石发现红军跳出其包围圈后，旋即调动 10 万军队进行围追堵截，原先设想之相机打回苏区的预想已无法实现，红四方面军只能继续向北转移。

10 月 16 日，张国焘决定：“为了保证部队轻装行军作战，营以下职务的伤员就地遣散，自找归宿；营以上的仍然用担架抬着随军行动。”这一决定意味着，一些伤病员可能就要落入国民党军或民团手中，凶多吉少了。尽管前途漫漫，环境险恶，条件极为艰苦，各师领导们却尽可能地抢救负伤的干部。比如，陈再道、滕海清、胡奇才等都是负伤后被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带入西征的队伍中，边走边疗伤的。

负了重伤的滕海清在遣散之列，他拄着拐杖，追上了后卫部队，见到野战医院院长后，院长为上级的规定感到十分为难。此前，倪志亮曾在 1932 年 6 月将三十二团五连连长滕海清调到师通信营当排长，管理一些打了败仗待分配的营连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后，倪志亮对院长说：“通信营的一排长是管营连干部的，职务相当于副团级，要按营以上伤员待遇对待。”滕海清因此得以留在野战医院养伤。伤愈后，滕海清被派到保卫队当指导员，几天后又被倪志亮派到清江渡东南组织游击队。多年后，滕海清成长为二十一军首任军长。

住在后方医院的十一师三十二团三营营长陈再道，因 8 月 8 日在猛攻麻城陡城山时受了重伤，子弹从右臂上部打进去，又从背颈下穿出，差点打中咽喉，击中颈动脉。大难不死的他被医生告知“好好养伤，过一两个月，你就可以出院”。有一天，他在医院换药时，门外传来一阵马蹄声，原来是师长倪志亮来找

他。倪志亮一见面就打趣道：“陈再道，大家在前面打仗，你小子倒不错，住在这儿不走了。”“他伤还没好，需要继续住院治疗。”医生如实地解释。倪志亮急促地说：“你别听他的。你能不能骑马？能骑马的话，就赶快跟我走！”他不顾医生的阻拦，硬是把陈再道接出了医院。回到部队后，陈再道才知道师长的这番苦心，要是等到伤好再出院的话，恐怕就再也找不到部队了，共和国也将少一位开国上将了。陈再道每每念及此事，打心眼里感激师长。

11月初，红四方面军进入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这里有伏牛山、鲍鱼岭南北相依，又有丹江和汉水贯穿其中，地形有利，粮食给养充足，非常适合建立苏区。然而，红军将士不知道，危险正向他们慢慢逼近。部队休整三天之后，在敌人三面进逼的情况下，决定继续西进，经漫川关入汉中。国民党军的气焰十分嚣张，企图一举围歼红军于漫川关东20余里悬崖峭壁的深山峡谷之中。^[2]胡宗南甚至放言：漫川关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坟墓。

狭路相逢勇者胜。决定命运的漫川关突围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徐向前当即命令：以红十二师为开路先锋，在红七十三师配合下夺路前进；红十、十一师各一部抵御南面和西面夹击之敌。红十二师受命后，即以三十四团为尖刀突击。11月12日，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沙世友接令后，率部向张家庄通向西南的一个小豁口——垭口高地猛虎般地发起了进攻。

鉴于垭口的重要性，总政委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排，亲自率领三十四团二营抢占了张家庄外沿的北山垭口右侧高地，用火力的封锁住了敌人后续部队增援的道路。他边指挥战斗，边说：“一定要坚决守住这个垭口，不然全军就被堵住了。”团长许世友交代二营营长吴世安说：“你在这里听总政委指挥，叫你怎么打就怎么打，打光了也要完成任务！”

说完，许世友转身又奔向一营阵地指挥战斗。这时，许团长的眼睛又瞪圆了，他腰里扎着一条足有四五寸宽的灰色腰带，别着两支驳壳枪，背后斜插着一把磨得锃



抗战初期的许世友（转战川陕时为三十四团团长沙）

亮的长柄朴刀，袖子卷得老高。大家一看团长的模样，便知道是硬仗恶仗，于是精神抖擞，士气倍增，誓与阵地共存亡。

一营像饿虎扑食一样，一个反冲击，夺占了垭口的有利地势，接着像钢钉一样扎在最前沿。敌人以两个旅的兵力，轮番向一营阵地进攻。战斗空前激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一营指战员前仆后继，营长倒下了，连长接替上去，连长牺牲了，排长接……营长最后是由营部一名姓陈的号兵代理的。但一营阵地始终没有丢失一寸。

在经历三天两夜殊死之战后，三十四团牢牢地控制着垭口通道，使得方面军主力全部顺利从垭口通道脱险。漫川关突围战是红四方面军转移过程中生死攸关的一仗，直接关系到方面军的生死前途。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徐向前同罗应怀等红四方面军老战士谈起当时的战斗场景时还无限感慨：“漫川关突围，真是很危险啊，多亏了三十四团在北山垭口顶住了。”

漫川关突围后，红十二师另两个团（三十五、三十六团）继续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抢占竹林关，随后向西过商县，直至商县以西50里的杨家斜才短暂停留。红四方面军原本计划部队南下镇安、柞水，而后再进汉中。而此时，胡宗南的部队赶来阻击红军进军汉中。由此红军旋即掉头向北，越过秦岭，出库峪、汤峪，于11月27日出现在关中平原，兵锋直指西安。正当敌军积极调防部队围堵红军时，红四方面军又虚晃一枪，在西安以南40里的王曲、子午一带向西而去，由辛口子出发，再次翻越秦岭。红四方面军冒着风雪，忍饥挨饿经过几天艰苦行军，连翻太白山、马道岭、牛岭、兴隆岭、财神岭、父子岭、卡峰梁、老君岭、青刚岭九座大山，于12月9日抵达秦岭南麓的汉中平原城固南部小河口镇。

1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在此召开了决定部队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这也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方面军总部举行的第一次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史称“小河口会议”。会上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急躁冒进，以及反“围剿”失败后不明不白地无止境向西转移进行了尖锐批评。张国焘在当时巨大压力和严峻形势下，诚恳地承认自己诸多错误和不足；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和决策，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12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与陕南地下党城固县委游击队领导人王燮、胡哲取得了联系，并了解到当时四川军阀力量主要在川西混战，川北防御力量空虚；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和蒋介石又有着很深的矛盾，致使蒋的部队很难进入四川；因此，决定渡过汉水向川北进发。

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冒着风雪严寒,翻越横亘川陕边界的大巴山,于25日出其不意地占领了通江县城。在随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又占领了巴中、南江,创建了川陕苏区。从此,红四方面军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取得了西行转移的最后胜利。此时,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共有4个师12个团,1.5万余人。^[3]

此次3000里转移的总里程和时间跨度,没有两年之后中央红军长征的距离长和时间跨度大。但3000里转战是红军战史上的第一次远征,和两年后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着相似的情况。两者都是从苏区出发后,多次变更战略目的;都是由外线作战胜利后再返回苏区的战略意图变更为全军规模的大转移,并根据形势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战略决策,最后找到部队的“落脚点”。

此次“小长征”的深远意义还在于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从客观上调动了大量国民党中央军、西北军和四川地方部队的军事力量,战略上配合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再次,这次3000里转战为之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以及1946年解放军中原军区部队“中原突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后来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受益于红四方面军先前的突围路线,就连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解放军向西的突围方向都大致沿用了红四方面军的西进路线。

1933年2月中旬,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頌尧以近6万人的兵力分三路进攻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经四个多月的机动作战,在空山坝地区取得了全歼川军7个团、击溃6个团的大捷,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收复南江、通江、巴中,共毙伤国民党军1.4万余人,俘1万余人,苏区得到巩固,面积扩大一倍以上,红军得到大发展。

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1935年6月15日刊发社论,这样评价:“红四方面军是现时中国苏维埃运动三大主力的最大的一个,它的长期的光荣的战斗历史,是不亚于中央红军的。它于1928年产生于鄂豫皖边,创造了鄂豫皖苏区,成为当时长江北岸最大的苏区。1932年底,它向西转移到川陕边,几年的奋斗中,创建了川陕边苏区,并从万余人的队伍扩大了10万左右。”^[4]可见,红四方面军的3000里“小长征”,在中国的川陕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新局面,为后来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木门会议猛烈扩军

反“三路围攻”取得胜利，红四方面军接着就召开了“木门会议”。会议于1933年6月28日在四川旺苍县木门镇木门寺召开。这是一次包括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一百余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军政干部参加的重要军事会议。徐向前、陈昌浩主持会议，会期6天。

会议的相关内容包括，总结之前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红四方面军扩编；部队内部“肃反”问题；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和军政训练问题；加强学习，重视总结实战经验五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根据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部队于1933年7月上旬进行了整顿扩编，4个师扩编为4个军11个师。

各军的司令部、政治部也在原来各师领导机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各军还有直属医院、修械所、担架连、特务营和迫击炮连。这时，在川陕边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为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陈昌浩仍分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曾传六。方面军的直辖机关和部队有参谋处、总经理部、总医院和警卫第一团、第二团、妇女独立营等单位。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军委领导，校长为倪志亮兼。整个方面军共4万余人。^[5]

根据先前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肯定了收紧阵地的必要性，研究川军作战特点，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后来曾中生所写的《与川军作战要点》、《与“剿赤军”作战要诀》、《游击战争要诀》三篇重要军事著作都做了总结。包括对战争的指导，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肯定“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强调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主张打运动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阵地战和战役的持久战；注意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强调依托根据地作战；强调攻击精神。

会后，红四方面军还积极开展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工作。

除了扩编和整训的内容外，木门会议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检讨“肃反”问题。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时便大搞“肃反”。不仅在红四方面军内部，而且在地方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只要是“社会关系复杂的”、“有点文化的”人都成了“肃反”的对象而被加以“肉体消灭”。这也是导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

反“围剿”失败的直接原因。可以说，红四方面军是带着“肃反”的伤痛离开鄂豫皖老区的。虽然，一些干部战士对此问题已经有所察觉并持有不同意见，但是由于一直在行军作战，也没有机会袒露自己的想法。

尤其在反“三路围攻”的战役中，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令陈昌浩和保卫局在部队中抓人。如，红七十三师在战斗中丢失甑子垭阵地，就立即在全师清洗“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逮捕400余人，杀掉100余人，其余罚做苦工。丢失阵地的二一八团排以上干部大部分被抓，连同部分班长在内，共被捕200余人，团政委陈少卿被诬陷为“改组派”，严刑拷打后处决。

在这一时期，李先念、徐向前等许多领导干部都对这样的“肃反”进行了坚决抵制。红九军（此时应是十二师，木门会议后扩编为红九军——本书作者注）七十三团政委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被列入“审查对象”的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知道后保了他，并气愤地打电话给负责人陈昌浩：“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拼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啊？”^[6]

李先念也接到过保卫局送来的黑名单，一看多是些从鄂豫皖转战过来的老红军，连他原来的警卫员张明喜的名字都在内，就把名单往口袋里一装，说：“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嘛，不要管，等打完仗再说！”就此保护了这些同志。他后来说：“当时我怎么也不相信从鄂豫皖到川陕，历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的同志会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吃不了这样的苦，受不了这样的罪！”^[7]

木门会议上，面对大家慷慨激昂，强烈要求停止部队内部“肃反”的现实，陈昌浩原本顽固的“左”的脑袋似乎清醒了稍许，肯定先前在部队中“肃反”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承认抓错了一些人，并且同意停止“肃反”，将错抓的人放回。不过，由于“肃反”的实际领导人张国焘“左”的思想根深蒂固，轻视和排斥知识分子，搞“唯成分论”，将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列为“肃反”的重点对象。对张国焘来说，“肃反”不仅是出于其“左”的意识形态上的考量，更是其对红四方面军掌控的一种手段。

就在木门会议召开期间，张国焘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了《红军中的肃反工作》专题文章，点名红四方面军中的余笃三、赵箴吾、王振华、徐永华、王振亚、杨白等为“托陈取消派”的主要领袖。因此，木门会议关于停止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的决定并没有切实落到实处。

事实上，在木门会议后一个多月，张国焘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肃反”。先是

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名义免去曾在“小河口会议”中向其提出批评意见的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并在8月1日，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活动”的罪名，将其秘密逮捕。

更令人痛心的是，除了曾中生被捕之外，先前已被逮捕的红四方面军总经理处主任余笃三、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璋被杀害。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后，自九十八师师长蒋群麟、九十九师师长冉南轩以下200多名青年干部被杀，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干部五六十人。1933年下半年，四川省委输送到川陕苏区的200多名党团干部，也大部分被杀，甚至连中央派来的廖承志和罗世文，也被扣上“蒋介石特务”的帽子遭到软禁。

如此这般，使得红四方面军中知识分子干部急剧减少。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连作战命令和书信都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严重地制约了部队干部战略战术指挥的能力。因此干部文化程度偏低，轻视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也成了红四方面军作战能力和部队后续发展建设的一大障碍。

木门会议在红四方面军建军上是一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木门会议的召开，虽然关于停止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的决定并没有切实执行，会后，张国焘又掀起了新的“肃反”高潮，但红四方面军在木门会议后经过扩编、整训，以及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恢复彭杨干部学校之后，战斗力更加强大；并且总结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的经验，布置今后工作，检讨过去的一些错误，增强部队内部团结等一系列的举措，为后来取得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性战役的成功和反刘湘“六路围攻”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反川军“六路围攻”

1933年秋，川陕苏区经过发展，建立了包括500万人口、23个县、面积4.2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苏区。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了5个军8万余人，在战略上形成了雄踞川北，背靠巴山，东可以出鄂西北，西可进成都平原，北窥陕南，南逼江东地区万县、夔门刘湘老巢之势，川陕苏区进入最鼎盛的时期，使刘湘和蒋介石感觉到对其在四川的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9月，刘湘击败刘文辉，结束了双方在四川的混战，四川的军阀间开始形成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刘湘遂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

区。10月,蒋介石调动50万大军开始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与此同时,在蒋介石200万元军费、万余支枪、500万发子弹支援和严令下,刘湘于10月4日在成都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总部设于成都,电称:“今幸内争救平,各军咸归,一致剿赤,筹备亦已略备端倪,谨拜新命,克日前驱,誓扫赤氛,用奠邦国。”

刘湘以其所属的第二十一军为主力,纠集四川各军阀及其他部队组成“六路围攻”部队,并于6日下达动员令。在西北起广元、东至城口的千余里弧形线上,敌人共集中了120多个团约20万人,另有空军飞机18架。其预定围攻计划分为三期。妄图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式,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陕边境。刘湘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的红军。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鉴于刘湘的“六路围攻”初期敌强我弱,敌军士气高涨且来势汹汹,采取两个对策:一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收紧阵地,逐次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从而扭转战局;另一个是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齐动员,以人民战争来对付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

具体到作战部署上,分为东线和西线两个主要方向。东线由徐向前担任前敌总指挥,西线由王树声担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居中策应,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就地配合红军作战。正是这一前所未有由8万多红军和大量地方武装构成的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体系为抗击“六路围攻”的20余万敌军进攻,夺取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与陕军孙蔚如部继续保持着互不侵犯的协议,使红四方面军能够集中力量来对付当面之敌,为反“六路围攻”的最后胜利又多了一重保障。

很快红军就与“围攻”的敌军相遇了。不过,首战交锋对双方来说都有些出人意料!

10月底,毫无准备的徐向前红四军十师一部,在向南进攻廖雨辰部,准备进占开县、开江时,在开县以西杨柳关地区,遇上了刘湘主力二十一军第三师王陵基部。徐向前派了一个通信员给部队送信,没想到小伙子摸错了路,跑进敌人营地的伙房里去了。还要了碗水喝,抬头一看,人家的帽子不对,就赶紧往外跑。川军发现后,乱打了一阵枪,也没伤着他。他回来后报告情况,徐向前等红军指战员才知道敌人就在跟前。徐向前豪迈地说:“既然与敌遭遇,那就狠打一家伙吧!”就这样,这场颇具戏剧性的遭遇战拉开了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大幕。经过五天的激战,红军虽然歼敌5000余人,但敌第三师武器装备精良,

又有火炮和空中力量的支援，并且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增援上来，因此红军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节节抵抗，逐次向后收缩阵地。

12月中旬敌人开始了第一期的进攻。六路敌军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同时向红军发起了攻击，企图一举攻占宣汉、达县、仪陇和旺苍坝等地，进而逼迫红军退入大巴山，以利于其进行封锁和围困，从而消灭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依据地形和先前构筑的野战工事顽强抵抗，在完成给予敌重创并迟滞其前进速度的既定目标之后，于12月17~18日撤离宣汉、达县等地区。西线的红军也在广元、苍溪、仪陇等地区对敌大量杀伤后，向东收缩防御。

1934年1月下旬，东线红军部队将左翼阵地收缩至沿山场、罗大湾、罗文坝一带；右翼阵地在北山场、马渡关险要地带坚守。1月23日晚间，红三十军二六五团在团长邹丰明和政治委员黄英祥的带领下，迅速穿插至进犯而来的敌人左翼后方十余里的庆云场，向敌第四师十二旅预备队一团人马发起突袭，并全歼之。同时在该部前沿的敌人两个团也在红三十军正面部队和二六五团的夹击下，大部被歼。四天之后，红军东线部队在毙伤敌2000余人后，主动撤退至大垭口一带。东线战事稍息，双方进入对峙状态。西线的各路敌军，也观望不前，无多大进展。

2月上旬，东线的红军乘敌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回万县同家人过年和敌军春节休整之际，集中红九军和红三十军各一部，向冒进至马鞍山、毛坝场之敌实施了迅猛的反击，于11日拂晓，全歼了郝耀庭旅并击毙了郝耀庭本人，消灭了敌第三师第七旅大部，将战线稳定在了马渡关、红灵台、毛坝场一线。刘湘盛怒之下将王陵基召回成都撤职囚禁，将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许绍宗接替王陵基担任第三师师长，而其所谓的第一期进攻就此收场。而三个多月前宣称的“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红军的叫嚣也不了了之，没有下文了。

3月3日，刘湘向各部队下达了第二期总攻令。预期在一个月内在西线红军压缩在巴中以北和木门以东地区，东线占领万源城，突进到石盘关到竹峪关以北一线，进而封锁川陕至镇巴的门户，截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道路。东线红军部队在红灵台、老鹰嘴、毛坪地区击退唐式遵的猛烈进攻，使其付出5000余人的代价，粉碎了东线敌军的进攻。不过西线红军力量过于单薄，战线拉得较长，战至3月19日，陆续撤出旺苍坝、木门等地，西线的敌军达成了第二期总攻的预期。

战后，唐式遵仿清朝剿灭白莲教王三槐部的战例，给刘湘发电报建议“赤匪主力集结通江，职部当面左翼为老鹰岩，右翼为罗大湾，数十要隘，形如肝叶，昔王三槐据此一线，附者数万，清兵相持数载，不得寸进，因罗斯举引导，清兵由保宁、南巴进攻通江，破匪老巢，乃告崩溃，形势所关，今古同辙。伏乞迅速督促友军，由巴东进向左横扫，山势既逐渐就低，匪方尤腹背受敌，双方夹击，决可一举歼灭”。

4月3日，敌军发动第三期总攻。红军顽强阻击，在大量杀伤其有生力量的同时，继续诱敌深入。至4月底，在使敌人付出了损失万余人的代价后，西线红军陆续撤出江口、长池、南江等地，转移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东线红军则撤到万源城南，至刘坪一线。而此时，川军的老毛病也开始慢慢地“发作”了，西线各军借口供应困难，一再龟速前进，各路部队亦不愿再为刘湘卖命进攻了。

而刘湘在近半年的第三期总攻中，共损失兵力35000余人，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川陕红军的预想，早已成了空话。各路军阀部队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相互间矛盾加剧，士气低落。刘湘为了扭转颓势，于5月间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以答应拨出300万元军饷和300万发子弹接济各部队，同时保证“剿赤”结束后各路军阀均得到“安全保障”的承诺，发动第四期总攻击。调暂编第二师、教导师第三旅、模范师1个旅组成总预备军，以教导师潘文华任预备军总指挥。因此，敌人参加“围攻”的兵力达到了140余团约30万人。其中，刘湘投入其总兵力的五分之四，80余团10余万人。部署第一路向川陕边界的两河口推进，截断红军入陕道路；第二、第三路进攻得汉城；第四路和总预备军一部进攻竹峪关；第五、第六路攻占万源及其西线。以唐式遵的第五路担任主攻，并以夺取万源为主要目标。

6月22日，刘湘的第四期总攻开始，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因遭红军多次打击，心有余悸，怯战不前，一直徘徊于小通江河西岸。只有充当主力的唐式遵第五路及其裹挟的第六路全力以赴，猛打猛攻。

7月上旬至8月上旬，敌第五路和第六路集中了50多个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万源城南各个高地发起了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敌人采取了大纵深、多梯次的人海战术，整团整营地轮番进攻。西线红军部队撤至小通江河以东，在北起碑坝、南至鹰龙山一线，与敌隔河对峙；东线，在万源城南，红军凭借着连绵不绝的山岭和新构筑的工事御敌。守卫的红军指战员则凭借地形优势，士气